

周恩来专机 机长的回忆



纪实文学丛书

李克菲、彭东海等

江苏文艺出版社





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

纪实文学 29

李克菲、彭东海等

江苏文艺出版社

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

著 者：李克菲 彭东海等

责任编辑：陈敏莉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封面印刷：淮阴新华印刷厂

正文印刷：沐阳县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125 插页2

字数：140,000 199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1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230-2/I·220

定 价：2.5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	一位企业界名流的自白	赵长天
61	“作家楼”与“作家楼主”	庞瑞垠
87	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	李克菲 彭东海
136	只有她没有举手	任新 董葆存
151	沉默的盗枪者	潘存根
271	纪实的阅读值	王 干

一位企业界名流的自白

赵长天

写在前面

我采访他是准备写小说的，动笔时却犹豫了。现在有几个人看小说哟！或许是社会节奏快了，人们舍不得把时间花在巴尔扎克式的洋洋洒洒的环境描写气氛渲染人物刻画上；或许是文化程度提高了认识水平深化了，人们不再心甘情愿地为编造出来的离奇情节掬泪，宁愿看生活中真实的故事。于是，纪实体的作品风靡，我们这些写小说的只好乖乖地晾在一边。

何苦呢，我想，有这么厚厚一本采访笔记，有这么丰富生动的素材，为什么非得挖空心思地把真的编成假的？我劳心费神宵衣旰食，换来一哼：编出来的呗！何苦？

我决定偷一次懒，将采访笔记略作整理，抄录如下。仅更改几个姓名，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原始，顺序上免不了有些杂乱，但绝对是原汤原汁，没有走味。

* * * * *

我这个人还是有点东西可以写的。喔，我这么说不知道你习惯不习惯，是不是觉得我有点那个……不大谦虚？

（不，我喜欢坦率一些。）

那就好。我们也算是前后的校友，我不把你当作一般的

作家、记者，可以谈得随便些。

（太好了。）

反正作为你写小说的素材嘛，没关系。

（假如作为真实的传记、报告文学写呢？）

……其实也无所谓。树大招风，树大也挡风。象我现在这样，在企业界也有点名气，说老实话，别人要来整我也不那么容易。

我的出身……11届3中全会以后，有相当一批象我这样的人被推上领导岗位。我没打成右派，但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也差不多。上岗以后，不光是我，相当一批人，我们工作是很努力的，是拼命干的。有些群众不理解，不理解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我们自己心里当然很明白，可要说出来，要把它说清楚，倒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概括的。

我是1950年底参军的。那个时候，在光华附中读书。当时，没有一点家底的人，是进不了这个学校的。

我这个家庭是国民党的上层，可以说是很高很高的上层。我父亲是孙中山时期国民党的核心人物，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家和孙家紧挨着，我的大姐大哥和孙家的后代都是同学。这么个家庭，官僚家庭，三妻四妾，我妈妈是第六房。在这么个家庭里面，我从小受的是爱国主义的教育。

我这么讲，好象逻辑上又有些讲不通了。腐败的、国民党官僚的家庭，还谈什么爱国主义？你，能理解吗？

（我知道，人是很复杂的，但我不了解你的家庭，你能不能讲详细一些？）

我先说一件事情吧。二十年代初，铁路系统有一些主张联俄联共的国民党员，成立了一个铁路工人教育委员会，主任是铁路总长，我父亲是副主任，培训了几百名工人讲师，散到各地。后来共产党搞工人罢工，李立三在铁路系统搞暴动，骨干分子都是这批讲师培养出来的学生。

我爸爸有件羊毛衫，补得千疮百孔，老要穿在身上，还老喜欢问我们：你知道这衣服是怎么来的？我们听过不知多少遍了，有一次他参加铁路工人的聚会，军阀张作霖通令抓他，他逃到工人家，工人保护他，那天很冷，工人给他这件羊毛衫，他就特别珍爱。

他也保护过不少共产党。和胡汉民联合通电反蒋后，他去办暨南大学，那时候蒋介石反共，李达东躲西藏，最后就跑到暨南大学当系主任，国民党不敢抓他。

所以我们小时候对共产党的印象不坏的，尽管社会上宣传共产党青面獠牙，我们是不信的。

我57年从部队回家探亲，碰到父亲，他说：我在香港有一大包东西，放在箱子里，是朱德、周恩来、郭沫若给我的信，我都保存着。国共合作北伐时，我是交通部长，运兵动用火车，都是我安排的。搞军饷，没钱时，周恩来就来找我了。和共产党的这一段因缘关系，老头子很得意的。57年他从海外回国，我问：你怎么敢回来？他说怕什么，总理叫我回来的。

那时候参军，也不懂什么革命不革命，投笔从戎，匹夫有责，抗美援朝嘛，和打日本时一样，就这么个思想，爱国主义。我从小到大，受爱国主义教育很深，我母亲给我讲过很多爱国主义的故事，岳飞呀，王昭君呀。当时光华附中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有传统的。还是在解放前，一些老师，上课来，就大骂国民党。解放后又参加一些学生会的工作，抗美援朝就带头参军，毕业班差不多走光了，剩下没走的现在都是高知。再一个就是家庭的影响，我小时候在香港长大，后来香港沦陷，父亲被日本人抓起来，秘密传条子出来，让我们到后方去。两个小哥哥都是通过秘密通道到重庆，参加国民党的青年远征军，抗日3年，胜利后回上海才考大学。所以家里有这个传统，当国家有难时去服役两年，回来再去读书，也不知道去就是参加革命了。

我参军的消息一传出去，震动可不小，国外的亲戚呀，姐妹呀，纷纷来阻挠。在香港的大姐左一封电报右一封电报，说你可不能和美国人去打仗。你假使想工作，出来，姐夫给你在香港安排；假如想读书，送你到美国留学去。我不干。我母亲就我一个儿子，独子参军很不容易。我就这么参军了。

一到部队就参加政治教育运动，头3个月交代家庭的政治问题。我一点顾虑也没有。我这个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除了蒋介石，其他几位都是我家的常客，座上宾，我就一个一个交代，哈哈，国民党上层人物一共交代了100多个。态度好，成了海军部队的典型，多处去作报告去介绍，让大家都对党忠诚老实。以后……以后就一场接一场地参加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押送回来，我才36岁！正是风华正茂的黄金年龄，正是发挥才智干事业的时候！

我的前半生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个人的命运和党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什么时候党的路线比较正确了，我的日子就好过了；什么时候党的路线不对头了，我的日子就难过了。

11届3中全会以后，整个干部路线变了，把我这样的

人也提起来了，一步一步提起来，我脑子里就一个念头：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候，时间也不多了，算算也就十来年，这辈子还想有所作为的话，趁现在多干一点。这种心情是很真实的。我想，有这样想法的人恐怕不少，许多有过类似的曲折经历的人，心情是一样的。有一个对比，过去我也没少干过，通宵达旦地干，可是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好事轮不上你，等运动来了就活该你倒霉。象小媳妇一样过日子。3中全会以后就不一样了，可以放开手脚干了，还不抓紧干呀？这是一种心理状态。

还有第二种心理状态。我是曾被打入社会底层的人，我当过“牛鬼蛇神”班长，当了3年，在里弄里倒马桶捅阴沟什么活儿都干过。到过社会最底层知道离开了组织的痛苦。受不到尊重对知识分子是最大的侮辱。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讲士为知己者死，现在，还怎么能不死劲儿干呢？

另外还有种心情，已经经过那么多浪头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嘛，再有什么事情也不那么在乎了，胆子比较大了。过去毛主席讲无私者无畏，我体会这句话最深刻是什么时候呢？是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以后，回到上海，什么都不怕了。没处理的时候，一直翻来覆去掂量：会给我什么处分呢？不至于枪毙吧，但也难说呀，王明路线那时候，错杀不也就错杀啦？处分以后样样不怕了，回到上海就给总理写信，给中央军委写信、申诉。申诉书递上去之后，我知道不会那么太平，会有事情的，果然没几天，公安局找来了，让我到专政队报到，控制起来了。控制起来也不怕，起码是看到底了，最多把我抓起来，抓起来还得管饭吃，我在里弄里一分钱也没有呢！

所以我们这批同志工作起来劲头大，胆子也大。当然，反过来也有人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我觉得我自己这几年有些事情看得比较穿了，该闯闯了。

还是从头说起吧，当厂长那一段以后再说，先讲讲我的人生经历。

我的童年时代，自出生到1944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夕。44年我12岁。这个阶段我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几件大事情。第一件事情，我父亲原来担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校长，被赶下了台，是在1936年；第二件事是抗战爆发，全家迁到香港；第三件事，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父亲被捕；第四件事，1942年父亲被日本人押回上海。这么做个比喻吧，如果说父亲从国共合作到当暨大校长是我们家庭的鼎盛时期，那么我的童年，恰巧是家道中落，是衰亡时期。

1934年，当时暨南大学越办越兴旺，蒋介石和他的嫡系CC派蓝衣社要把我父亲赶下台，不让他势力增长，这个时期持续了大约一年时间。最后一两年，国民党采取了经济上的压力，不给暨南大学充足的资金。我父亲就用自己家里的财产来顶一段。过去，我们家可以说是家有万贯，到处有地产，后来逐渐变卖，一直到变卖我母亲的首饰，都卖光了。这时候，就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无法支撑下去的情况下，他下台了。正是抗战前夕。沦陷前，全家逃到了香港。

到香港以后，家里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那时主要靠三样，第一是靠暨南大学同学会学生的资助，过一两个月总有

人寄钱来，有时也不知道是谁寄来的。我父亲对学生是很好，有的同学成绩很好，因为家境贫困没钱出洋留学，他就用学校的名义资助，实际是他自己的钱。所以学生待他也很好，他落难了，南洋的一些学生就募捐。第二是靠书法换钱，他写一手好字，就经常写一点，卖点钱。第三，他有点名气，一些大公司请他当顾问董事，一些虚职，领点补贴。

这种经济状况，倒也一直撑了几年。表面上，还在香港山顶上，面对浅水湾，干德道51号D租了一幢小洋楼，也有几十间房间，什么听差呀、汽车呀也都有，开销还不小，表面上还维持着大家的派头，实际上已经是外强中干了，政治上经济上都已经没落了。

我童年还是养尊处优的。我家请了个娘姨，我叫她杨妈。我母亲生了五个小孩，我是唯一的男孩，母亲很疼我。我妈妈和那位杨妈对我思想影响是很大的。我妈妈要操持这么一个家庭，很难，就常跟我叨叨咕咕，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当我讲到等我长大了以后，象我的大哥大姐们一样要去留学什么的，她就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家不是过去啦，今后是没有人给你钱去留学的，想留学就要靠自家去争取。她说过去有钱时怎么怎么浪费，摆食物专门有个小仓库，火腿一买就是几十只，最后都烂掉，造孽呀，现在遭报应啦！家里其他人都大啦，他们和我们不是一房的，他们不会照顾我们的。这就是母亲对我的教育，一是教育今后的日子要靠你自己去闯，家庭是靠不了的，兄弟姐妹也靠不了，要靠自己；二是不能过大少爷的生活。这，对我有很深刻的影响。

杨妈呢，经常在哄我睡觉时给我讲故事。她是扬州人，就讲农民生活怎么苦，她怎么不得已跑出来帮工，跟我讲种

田怎么不容易，一粒米一斤四两水。我躺在床上，看着她，这些话，都印到脑子里去了。在她的管教下，我们倒也都很注意，吃饭不留一粒饭，吃得光光的。后来，她又给我讲一些很可怕的事，说乡下来信了，日本人怎么烧杀抢掠，女人们吓得脸上都涂上锅烟灰，因为日本人到处找花姑娘的干活。那时我还小，才10岁左右，听到日本人怎么残忍，用刺刀挑，把肚肠都挑出来，心里很害怕。就这么，朦朦胧胧地知道日本人是很坏的，长大了要有本事。这是最初形成的爱憎观点，人生世故的观点。

1940年，我8岁，读小学三年级。我姐姐在梅芳女中读书，我在附小。有一天，她说学校演戏，还有展览会，就带我们去。到学校，看到橱窗里展览的日本军刀和鬼子在沦陷区烧杀的照片，看得胆战心惊。那天看的戏，是我姐姐演的《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戏在我思想上刻下了很深的印痕。回想起我们从上海到香港，也是在很危急的情况下出逃的。我记得我们家是住在租界，那天晚上，只见闸北方向大火熊熊，半边天都亮了，飞机在头顶飞来飞去，轰隆轰隆的炸弹爆炸声不断传来。我听到大人们咕噜咕噜在议论，说日本人在炸什么地方了。过不久，我们站在弄堂口，就见到天上掉下来灰尘，一大片一大片的，下雪一样，黑的雪，夹杂着刺鼻的烟焦味。再回到家里，就见大人们扎箱子呀，准备行李呀，就仓皇出逃了。那时候还小，还不懂得害怕。初识人事之后，回想起来，就后怕了，担心日本人打过来。不幸，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沦陷。

日本兵是从海滩登陆的。登陆的前几天，晚上望出去，

对面大屿山上，已经是一片片的火光。我们提心吊胆地等着，等着大难临头。

就在沦陷的第二天，突然来了一名日本军曹，家里人都吓死了，^②大姐把脸涂得墨黑躲起来。那日本人进来倒很客气。嗨，他皮靴后跟咋地一碰，说：我奉支那派遣军司令之命，来保护国民党要人。门口贴了张布告，说是国民党要人寓所，任何士兵不准入侵。门口派了个日本兵站岗。我躲在门边偷偷看他，日本兵板着脸，一声不吭，也不理我。

我们左邻右舍的大公馆都被日本兵占了，胡来，花园里养军马，地毯被拖出来，放在园子里睡觉，乱糟糟一片。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日本兵在上山道上，躲在路边的草丛里。有三个砍柴人上来，他就朝天鸣枪，把三个人拦住，用枪逼着，把他們用电线绑在树上。然后，他就用皮带轮番抽他们，一边抽，一边笑，抽完了，笑完了，扬长而去。我恨死日本人了，日本兵真是太坏了。杨妈就在边上，一边哭一边讲，说乡下也是这样的，这下要遭难了。

大约过了十多天，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个日本人，叫我爸爸出来跟他们走，从此就音讯全无。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说国民党要人一百多人都被“请”去了，关在香港大酒店，这在历史上是著名的一件事。后来，我爸爸托人秘密送条子出来，关照家里能走的人赶快走，到重庆去，到内地去。我妈妈很紧张，晚上跟哥哥姐姐商量。我母亲生的大姐19岁了，交了个男朋友，我妈妈就说赶快结婚吧。我姐夫是学律师的，我妈妈不同意，说律师最缺德了，只要人家给钱，坏人也可以辩成好人，要我姐夫答应不做律师。我姐夫果真答应了，辞去律师，和姐姐结婚了。那时我的一些哥哥姐姐好象都通

过秘密通道到重庆去了，有的继续读大学，有的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到缅甸到印度去继续抗日。我们家里空空的了，只剩下我们四姐妹，最大的14岁，妈妈带着我们。一家人本来热热闹闹的，现在剩下我们几个，大宅院空荡荡显得很凄凉。

大概过了三个月，有一天，日本人来通知我们，说：你们收拾一下，准备走。

妈妈问：“去哪里？”

“上海。”

“去上海？为什么去上海？”妈妈摸不清葫芦里卖什么药，说：“我们不去。”

“嗯？”日本人铁着脸，用乌黑的枪口作了回答。

那是1942年2月，一个很冷很冷的夜晚。日本鬼子把我们五人押到机场。爸爸已经在机场了。我们真想抱在一起痛哭一场，但是在敌人的刺刀下，我们不能哭！我好象一下子就变得很懂事了，看着爸爸囚禁三月显得憔悴的脸，把眼泪咽回肚子去。

我们被押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军用飞机。起飞了，从舷窗看出去，旁边还有两架战斗机护航。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享受这样规格的待遇，不知道究竟飞往何处，前途是凶是吉。

半夜里，飞机降落在一个机场，听父亲讲是台北。飞机加油，我们被赶下来，等在水泥停机坪。风一无遮拦地刮来，我冻得直哆嗦，不停地喊：“冷死了，妈妈，我冷！”

“别响！别响！”妈妈搂住我。

一个多小时以后，又起飞了，然后就到了上海。真是莫名其妙，他们这样郑重其事地把我们押回来，可是到了上海，

把我们扔在街头就不管了。妈妈找亲戚借了点钱，在南京路新雅酒店租了两个房间住下来。

我的童年时代就这么结束了，我进入了学生时代。

1942年回上海时，我读小学四年级，我和姐姐都读四年级。可是妈妈说不行，一个是我读书太早了，脑子要读坏的，二是和姐姐一起读不好，硬把我拉下来一级，自动留级，读三年级。当时我考进上海振英模范小学，在建国路口。我其他功课都学得很好，就是日文，不愿学。一天，老师上课提问，我答不上来，就挨了三板子，好重哇，是个女老师，居然这么凶。我噙着眼泪，在肚子里骂她卖国贼。不过，毕竟还是怕挨板子，不敢不学了，六年级毕业时，得了全班第一名。

那时有个同学，到现在还是我的好朋友，是政法学院的教授了，那阵子，他很喜欢画《水浒》上的人物，《三国演义》上的人物。我很爱看他的这些古装画，关云长呀，赵子龙呀，他有时也讲些这种故事给我听，还要分析点道理，什么大丈夫人生在世要建功立业呀等，这和我的思想很合拍。

六年级的时候，抗战胜利了。一个同学去联系，和美国教会学校的小学生比足球。这些美国小学生很霸道，在足球场上就吵起来了。抗战也胜利了，怎么还要受外国人欺负，我心里气得不得了，吵得挺凶。

这几件事情印象很深，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从42年到45年这三年，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对我一生的成长起了很关键的影响。

第一件事是1942年年初，押解回上海以后，家庭经济很困难，华侨学生的捐款没有了，父亲只好专靠卖字画为生，我记得很清楚，隔几天就有人上门来收写好的字，妈妈还有些首饰，隔几天就去卖掉一点，隔几天就去卖掉一点。那时候，全国都很关心抗战什么时候能够胜利。我们常常在晚上听重庆的广播，把门窗关紧了，窗帘拉严了，倾听电波从遥远的地方送来的一会儿响一会儿轻的声音。一天，突然听到播音员在最后结束时说：“今天的新闻由程学燕小姐广播。”

“程学燕？”我喊起来，“燕姐！”

“真的，是学燕！”“呵，学燕！”

全家都兴奋极了，似乎觉得难以相信。从此，天天晚上雷打不动，一定要收听这个台。我们那个收音机是个很蹩脚的收音机，很难调出台来。因为家里就我一个男孩子，就由我来调。我似懂非懂，调得认真极了，充满了庄严的使命感。

我们那时住在建国西路506弄55号。日本人在香港大酒家关押的100多国民党要人中，有一位叶公绰先生，被押送回上海后住在506弄14号。程家和叶家挨得很近，我就常常到叶家去玩。叶家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儿子我好象没见过，他女儿已经十八、九岁了，我叫她叶大姐。在这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渲染教育，主要是在我家和叶家感受到的。

在这一阶段，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是在1943年的上半年，汪伪政府其实已经要撑不下去了，汪精卫要拉叶公绰参加伪政府。我常到他家去，总看到他愁眉苦脸的，后来干脆躺倒了，卧床不起，说是糖尿病发作了。又让他的三姨太到处放风，说他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去养病。

叶伯伯写字画画都很好，他为我们姐妹几个都画了画，为我画的是幅翠竹。画画时，我就为他磨墨、拿纸。他家也没别的小孩。叶三太（我们都这么叫她，是叶伯伯的三姨太）没儿子，她把红包都准备好了，要收我为干儿子，我妈妈不肯。叶伯伯这个人高风亮节，他给我讲一些故事都是有关人品的，讲他和我父亲都是从小没父母，一起奋斗出来的，男子汉要靠自己奋斗。他给我讲了很多这样的话，他也没事儿，就跟我聊天，其实那时我还很小，只有十一二岁。聊完天，就在他家吃饭，他家饭比较好，我也很高兴。

日本人逼叶公绰，叶公绰就装病，实在逼不成了，汪精卫就来找我父亲。

有一天放学回家，弄堂里停着好几辆汽车，我家门口肩长枪持短枪的好多人，拦住我不让进去。过一会儿，让我进去了，楼下客厅里满屋子都是人。后来，这些人走了，父亲大发雷霆，骂粗话，用广东话骂，说这事儿还来找我，我会替他们干这种屁事？都是什么时候啦，昏头啦，我会答应干吗？这批王八蛋，找错人啦！他穷骂，我妈妈就在边上哭哭啼啼，叫他声音小一点，别嚷嚷，他根本不听。开饭时候到了，佣人把饭菜端上桌，忽然，父亲猛地抓住桌布使劲儿一掀，满桌饭菜统统倒光，盘子盆子满地滚，汤汤水水四下里淌。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凶得这么可怕，吓坏了。这一顿，全家都没吃。接连骂了几天，才渐渐平息。

大约两三个月以后，放学回家，又碰到一次，和上次差不多。我悄悄问妈妈，妈妈告诉我，说是汪伪政府里有人，过去是你爸爸的同事，要你爸爸出来当交通部长，你爸爸不干。妈妈说，你们也要知道，这事情不能干的。但是现在日